

FANGZHU YU HUI GUI SU DONG PO JI QI TONG SHI DAI REN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放逐与回归

——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

洪亮 著



放逐与回归

——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

洪亮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放逐与回归——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洪亮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80647-677-6

I. 放… II. 洪… III. 苏轼(1036~1101)—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0627 号

书 名:放逐与回归——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

作 者:洪亮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640mm×940mm 1/16

印 张:25

字 数:41 万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80 元

ISBN 7-80647-677-6/I·419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号码:0791-6894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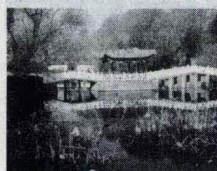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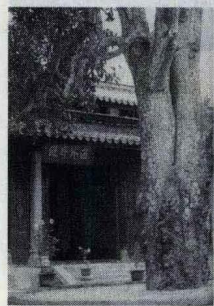
山雨欲来	1
士风初振	11
地灵人杰	28
名动京师	39
两位“储相”	57
签判凤翔	72
熙宁变法	84
西湖歌吟	102
密州太守	115
彭城日月	126
历史悲剧	141
桃源惊梦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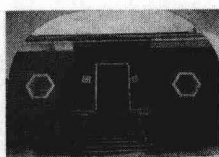
三苏祠



凤翔苏轼官舍



东坡书院后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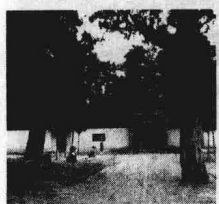
海南苏公祠



东坡书院载酒亭



东坡书院载酒堂



河南郾县三苏坟

“乌台诗案”	162
“东坡居士”	172
赤壁词赋	191
久戏风波	214
翰林学士	232
苏堤春晓	248
宦海浮沉	261
垂老投荒	275
天涯芳草	294
钟声永恒	320
“山谷道人”	352
余音袅袅	379
主要参考文献	392

山雨欲来

“陈桥兵变”——2月上旬——升平图——对待风雨，一个“戏”字——宋初的中央集权——外忧：与辽夏的争端——内患：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必然的趋势

公元960年2月2日。陈桥驿。

夜色如墨。一场密谋在夜幕的遮掩下悄然进行。

这是后周都点检（禁军统帅）赵匡胤的行辕。赵因屡立军功，深受周世宗的赏识与信任。周世宗病逝，继位的恭帝年仅七岁。前一年深秋，风闻割据山西的北汉会合契丹，准备攻周。后周宰相范质等不辨真假，“仓卒遣将”，正月初一，就决定派军权在握的赵匡胤前往抵御。赵于正月初三离开都城，当晚宿于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

北征前，京师已经风传：“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独宫内不知”。此夜，赵已醉眠帐中，他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却在军中频繁活动。诸将皆为赵匡胤的亲信，一拍即合，于是去找赵匡胤的掌书记（秘书长）赵普。赵普也说：“主少国疑，安能定众？”天刚亮，赵普即带兵变将士来见赵匡胤，力劝他抓住时机，自立为帝。赵大帅尚未答话，一件黄袍已经披在他的身上，众将一起下拜，山呼万岁。

赵匡胤讲了一番世受国恩、于心不忍之类自谦的话，接着厉声对部下说：尔等因贪图富贵而拥立本帅，必须听从本帅的命令，否则，这个皇帝我不能当！随即约法三章：对后周的太后与幼主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者有赏，违命者族诛。然后率军返京。开封守将石守信等，也都是赵匡胤的“义社兄弟”，开门迎入。“入城之日，市不改肆”。

几乎兵不血刃，就更更换了一个朝代。因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汴京（开



封)。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正月初四,即该年公历的2月3日,赫然载入了世界编年史。2月,在中国古代,实属多事之“春”。仅以上旬为例——

2月4日(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改北平为北京。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第四子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封地北平起兵南下,夺得帝位。改元“永乐”,又迁都北上。

2月5日(公元249年),发生“高平陵事件”。魏明帝死后,文武大臣曹爽与司马懿共受遗诏,辅佐年仅八岁的齐王曹芳,曹爽对司马懿深有疑虑,暗中削其实权,并派自己兄弟统领禁军。司马懿见形势不妙,“称疾,不与政事”。曹爽不放心,派亲信李胜去“看望”。司马懿装痴卖傻,喝粥时让粥流满前襟,说话语无伦次。李胜回报曹爽:“司马公尸居气余,形神已离,不足虑矣。”曹爽放松戒备,于2月5日(魏正始十年正月六日)



苏轼

陪幼王离开洛阳去谒祭魏明帝的陵墓(高平陵)。司马懿见时机成熟,下令关闭洛阳城门,占领军营武库,又亲率精锐扼守洛水浮桥,以断曹爽归路。这一切只发生于半天之间。事成,司马懿遣使去见曹芳,声称只想罢免曹爽,别无他求。但当曹爽交出兵权后,司马懿即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曹爽兄弟及其亲信一网打尽,处以死刑,并诛灭三族。自此曹魏政权皆归司马氏掌握。

2月5日(公元756年),同样在洛阳,安禄山登位称帝。

2月6日(公元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爆发。

2月7日(公元318年),汉王刘聪用药酒毒死已成为他俘虏的晋愍帝司马邺——司马氏的后代。晋愍帝被俘后,受尽侮辱。一次,刘

聪秋游出猎,命司马邺身穿戎服,手执长戟,为车马前导。又一次,刘聪大宴群臣,要司马邺为宾客洗爵斟酒,酒过三巡,刘聪要更衣入厕,又命司马邺手提马桶盖,在他身边侍候。即便如此,司马邺也难逃一死,死时为十八岁。历史就这样嘲弄着老谋深算的司马懿。

2月8日(公元1234年),金哀宗自缢,蒙古兵入城,金国灭亡。

2月9日(公元827年),宦官刘克明等将荒淫无度,日日以“打夜狐”(深夜狩猎狐狸)为乐事的唐敬宗杀死。

2月10日(公元589年),隋将韩擒虎攻入建康(今江苏南京),于胭脂井中俘获陈后主及其妃嫔。陈亡。

.....

这几张异代相接的日历,似乎浓缩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刀光血影的历史。但毋庸讳言,“陈桥兵变”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使中国再度回归一统,从而建立了常常被人与“盛唐”并称的“隆宋”。

由于战乱的弭平,人民得到了一定的休养生息。以租佃关系为特色的新的土地占有方式与剥削方式(土地买卖、实物地租、契约关系等),使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加上圩田、荒地的垦辟,耕艺的改良,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使农业发展大大超过了唐代。手工业如丝织、瓷器等,呈现五彩缤纷的景象。造纸、矿冶等,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商品货币的流通,更使一些大城市乃至中小城镇空前繁荣,夜市不禁……印书业(木板、铜板)普及推广,布衣毕昇又发明了活字(胶泥)印刷术……火药与指南针(水罗盘)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前者广泛应用于军事(火炮、火箭、火球等),后者催进了航海事业。这三大发明,对世界历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马克思曾予以评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经济学手稿·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在数学、天文学、医药学等领域,宋代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说:“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他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与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峰”。

但“隆宋”并未“隆”于政治。

于是鲁迅先生辛辣地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伪自由书·电的利弊》）

祖先发明的印刷术，排出了中国血泪交织的痛史。千年后的今天，我写北宋的悲患与风流。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于眉山（今属四川）纱縠行的一户人家。其时赵宋王朝建立已近八十年，在“升平图”的背后，封建专制社会固有的弊端，已开始显现。天边不时有电光闪闪、雷声隐隐。

既然苏轼选择了这个山雨欲来的时代，必将在成年后经受暴风雨的敲打（据他本人说，他生日摇篮的上方闪耀着不祥的星座——摩羯座，与韩愈相同，注定要经受许许多多的磨难，碰上各色各样的流言），直到晚年再贬渡海，还被穷追不舍。当时他写过一首题目很长的诗：《行琼儋间，肩輿坐睡（在轿中入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一个“戏”字，可以概括他平生对待风雨的态度。诗中之句，更显示他从容不迫的气概，有一种超常的人格力量融贯其间：“……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急雨好像有意激发他的诗兴，天上的云电，也为他梦中得到的好句而改容变色，并对他年衰语工感到惊奇；而这妙句，蓬莱宫中的仙人们已久未听过了。

自然的风雨化作内在激情，他的心灵与外界共有一种生命律动。浪漫主义精神在这里被表达得再淋漓不过了。清人汪师韩评此诗曰：“行荒远僻陋之地，作骑龙弄凤之思，一气浩歌而出，天风浪浪，海山苍苍，足当司空图‘豪放’二字。”

赵匡胤登基后，曾赋诗曰：“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的确，他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霸才，镇压了后周残余



势力的反抗,削平荆南与湖南两个藩镇,又先后灭了后蜀、南汉、南唐。宋太宗即位,拿下北汉,吴越王钱鏐又来归顺。不过与汉唐相比,赵宋版图最小,后晋石敬瑭出卖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仍在辽国手中,西夏也在宋辽之间朝秦暮楚。但在赵匡胤心目中,外部威胁远不及唐代藩镇割据、奴才欺主的教训更为深刻。藩镇之所以敢同中央皇室对抗,在于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为了防止别人也再搞一出“黄袍加身”,赵匡胤全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制。除了将握有重兵的将领解除军职(即“杯酒释兵权”)外,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留下“诸州度支经费”,其余全部运至京城。这便是所谓“强干弱枝”之术。

进一步便是分化事权、互相牵掣之法。仅举几例——

禁军由“三衙”分掌,但“三衙”有握兵之权,却无发兵、调兵之权,后两权在枢密院,而枢密院又不能直接掌握军队。南宋朱熹曾说:“枢密院号为典兵,仓卒之际要得一马使也没讨处。今枢密要发兵,须用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实际上,发一兵一卒都要皇帝画旨。

实行更成法,让士兵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状况。

提高御史台、谏院等台谏官的地位,许其风闻言事,纠举、弹劾各级高官特别是宰执大臣。

为了安抚人心,赵匡胤保留了后周整套官僚机构,却不让留职人员有相应的职权,而是另派官吏,让他们在头衔上带着“知”、“判”等字眼,去行使实权。这样,逐渐形成了官与职殊,名与实分,官、职、差遣分离的状况。“官”只表明一个官员的位品,作为领取俸禄的依据。“职”只是荣誉头衔。只有“差遣”才拥有行政权力。但对后者,又实行三年一易的制度,使其频频调动,不得专权。

鉴于唐代科举中主考官与被录取的门生结成政治联盟、进行派系斗争的教训,赵匡胤下诏禁止进士及第者称主考官为“恩师”、自称“门生”,后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录取进士,录取者便成了“天子门生”。在重文轻武的宋代,科举是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

为了怕臣僚有自强之志,赵匡胤一方面鼓励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置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另一方面倡导黄老之学与佛经禅



理,以使士大夫少其奔竞之心。

宋初在地域上的广度虽然减削,但统治的密度却大为增加。

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其兄“先本而后末,安内以攘外”的衣钵,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为之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若无外忧”的“若”字,很有意思,说明并非没有外忧。《宋史纪事本末》卷七载:赵匡胤于乾德三年(965)八月设置贮钱的“封桩库”,打算蓄满四五百万后,向契丹赎买幽燕之地;如果不成,“以二十匹绢购一胡人首(口),彼精兵不过十万,止费我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表明他把兵力消耗在对内作战上,待到勉强统一,已经没有向外进攻的锋锐。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鼓足勇气,乘灭掉北汉之势,移师攻辽,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宋军初战获胜,但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一役,遭到辽军夹击。宋军大败,太宗中箭,急乘驴车逃走,从此不再亲临战场。雍熙三年(986)宋军再次伐辽。东路军于岐沟关(今河北涿水东)溃败,西、中路军被迫后撤。西路军杨业由于得不到主帅潘美的支援。在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东北)战伤被俘,绝食三日而死。太宗从此放弃了收复燕云的计划,采取守势。辽国却转而为攻,不时南下侵扰。

景德元年(1004),辽承天皇太后、辽圣宗又大举进犯,回避了对一些城市的攻坚,直趋黄河岸边的澶渊(今河南濮阳附近),逼近宋都汴京。宋廷一片慌乱。大臣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只有新任宰相寇准等少数人力请真宗赵恒亲临前线,以振士气。真宗进入澶州后,两军处于相持局面,结果在当年十二月与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宋以辽承天后为叔母,每年向辽输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保持了一段相对平静。危机过后,王钦若转而攻击寇准,说他把真宗当作“孤注”一掷,订立耻辱的“城下之盟”。寇准因此被罢相。

宋与西夏的关系,更令人头疼。北宋初年,党项族首领李继捧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物,而宋太宗多少还有些树立威信的兴趣,通过一些谈判,继捧入朝,献出四州。但继捧的族弟李继迁闹了分裂,重新宣告独立,并向契丹求援。契丹立即册封继迁为夏国王,并把义成公

主许配于他。宋太宗派李继捧到西边发动,赐名赵保忠。保忠向宋廷保证继迁决心悔过,太宗又赐名李继迁为赵保吉。以为这样一来,西边仍然是赵姓的天下。可是,李继捧失败了,匹马逃回。李继迁则不管自己姓李姓赵,是继迁还是保吉,终于夺回祖先的地盘。真宗即位,承认继迁独立的事实,并授以节度使。继迁却看准了宋王朝的虚弱,向西扩张,拿下灵州(今宁夏宁武),不久将灵州改为西平府,建立了他的王国。李继迁后来战死,子李德明即位,在攻略河西诸州后,与宋修好。宋册封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两万斤;并重开榷场,进行贸易。

德明死,子元昊继位,将都城兴州(今宁夏银川)升为兴庆府。宝元元年(1038)筑坛受册,国号大夏,并撕毁勉强维持了二十年的宋夏和约,屡犯宋境。宋朝在西边驻军三四十万,但因诸将直接听命于朝廷,作战时互不联络、相援,难以合力攻敌,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三次战役,宋军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任福、葛怀敏等战死,伤亡惨重。而辽兴宗又于庆历二年(1042),趁宋朝疲于西线战事,用武力恫吓手段,迫使宋每年增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庆历四年(1044),元昊在内忧外惧(时辽在边境筑城调兵)的形势下,愿与宋重订和约。双方议定:西夏取消帝号,仍由宋册封为夏国主,夏国对宋名义上称臣,宋廷则“岁赐”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二万斤。另在各节日和元昊生日,再“赐”银二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衣著等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是时苏轼九岁。

外忧日甚,而宋代君臣仍以“天地父母”自居。吃了败仗,说是不屑与“犬豕豺狼相较”;进贡财物,说是“大富家舍施乞儿”。

宋太宗所谓的“内患”,是指臣僚政变、百姓造反。对前者,采取了上文所述的一系列防范措施。对后者,则袭用宋太祖的养兵制度,每年招募兵士,特别是荒年募兵,把大量饥民、流民,即所谓“失职犷悍之徒”,这些本来足以危害王朝基础的社会力量,转化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军事力量。

而当时较为清醒的士大夫所认为的“内患”,则是冗官、冗兵和冗费三大公害。



以冗官而言,由于分化事权,互相制约,造成重床叠架的官僚机构。宋真宗时,文学家柳开以“十羊九牧”为喻,形容机构的臃肿。加以政权扩大科举,按考生总额十分之一的比例加以录取,社会上各色人等,连和尚道士在内,都来应试,“以一日之长决取终身富贵”。仁宗时更下令:“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北宋统治者是想通过这种办法,让地主阶级各阶层的政治代表参加到政权中来,由此调节这个阶级的内部矛盾,加强封建专制的基础。同时也吸收少数平民,正如荒年募兵一样。

真宗时确定对官员三年一“磨勘”的考核制度,一般官员只要无大差错,每三年便可迁转一次,逐步爬上高官。而只要达到一定级别,都有“恩荫”亲属为官的特权。这种特权,可使中上级官员的子孙、兄弟乃至亲戚、朋友、门客、医生,免试获取官职。

宋朝是一个官僚的乐园。中级官员,特别是高官的俸禄优厚至极。宰相、枢密使正俸中的月钱即有三百千之多,这笔钱可买一百余亩良田。月钱禄粟之外,又有春冬服、随从衣粮和餐钱,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饲马刍粟、米面羊口之给等。清代赵翼在《廿二史

劄记》中评“宋制禄之厚”时说:“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即便比较正直的大臣如寇准,生活也十分奢侈。他的侍妾蒋桃曾写过一首诗进行规劝:“一曲清歌一束绡,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苏轼画像

冗兵,由于募兵养兵制而急遽膨胀。宋代兵士的口粮、月钱和衣服,数量颇为可观。此外还有各种特支、赏赐,戍边者有特赏,征行者有预支和额外添给。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一名禁军年支达五十千,厢军三十千。仁宗时蔡襄作过一个统计,朝廷百万大军的费用,占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后来张载说:“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朱熹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一中。”

冗费与冗官、冗兵紧密相关。加之朝廷大兴土木,修造楼堂寺观,仁宗后宫数千人,宫廷赏赐动以万计。赵翼提过这么一件事。古代冬至日,皇帝一年一度的祭祀南郊,在宋代改为三年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每祀一次,大小各官,皆得荫子,此外又有赏赉。因浮费之多,“不得不改为三岁一举”(《廿二史劄记》)。这一切靡费,再包括每年交纳辽、西夏的岁币及其他赠礼,使王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即所谓“积贫”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统治者拼命扩大赋敛,加重徭役,残酷地盘剥与压榨黎民百姓,即上文所引“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而官员、豪强、大商人也利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仁宗即位时,品官形势之家占田已达天下田畴之半。土地兼并(高利贷是其重要手段)使“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后来更发展到“一邑之财十(之)五六人于私家”。欧阳修在《原弊》中这样形容:农民“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粃而食秕稗,或采橡实、蓄菜根以延冬春”。司马光在其所上《论劝农札子》中,也描述了一幅惊心的场景:“今农夫苦身苦力,恶衣粝食,以殖百谷。赋敛萃焉,徭役出焉。岁丰则贱糶以应公上之须,给债家之求;岁凶则流离异乡,转死沟壑。”

这里提到了“徭役出焉”,宋代的差役极为繁杂,但官户可免,商人也大都“赋调所不加,百役所不及”,僧道、女户(女子为户主)、单丁(家中只有一个男丁)亦不负担。徭役按户等分摊。仁宗时,韩琦上疏:“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皆役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韩绛也提到:“闻东京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



“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朱熹语)。广大农民全然无力“举首奋臂”，以求温饱。求生不能，赴死不甘，终于爆发了一连串的起义。而我们知道，按中国农民逆来顺受、忍苦耐劳的特点，必须在他们每一个人最最个人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作出这个对他们说来颇为艰难的决定。

远在淳化五年(994)，宋太宗曾不无得意地对宰相吕蒙正说：“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赐，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不料吕蒙正避席对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未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太宗闻言，“变色不言”[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五]。然而正是这个贫寒出身的大官僚吕蒙正，每顿饭喝的一碗鸡舌汤，就须杀成百只鸡。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赵光义向吕蒙正夸耀天下太平之时，正是川蜀王小波、李顺起义之日。

“积弱”之势，与“积贫”之势一样，在宋仁宗时，也完全显露出来。由于对统兵将帅限制过多，使他们“不能自奋于一战”，再加上将不专兵和军纪不明，造成兵士骄惰不堪的积习。他们“游嬉于廛市间，以鬻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苏舜钦语)。“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欧阳修语)。骑兵不能披甲上马，射出的箭在马前一二十步就坠落于地。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官武将也参与了对商业利润的攫夺。他们霸占住许多兵士为自己服役。陕西一带，禁军中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京畿附近的禁军也多被武将、戚里权近之家占为仆隶。

如果说“积贫”带有两重含义，就是“三冗”所造成的国穷，以及向广大人民转嫁危机所造成的民贫，那么“积弱”也有两层意思：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农民的反抗，对外无力抵御辽夏的侵扰。

天空风云变幻，大地激荡不安。民愤，还有士愤，在沉郁中潜动、勃发，而后者更唱出了烙有时代印记的痛苦歌声。

士风初振

依样画葫芦——士意识的复苏——“寸心怀春风，思与天下芳”——庆历新政——进奏院事件——以道弘诗，以道振文：王禹偁、范仲淹、苏舜钦——北宋诗学“转悲为健”的开始

至道元年(995)四月，宋太宗准备任命吕端为相。有人说：端为人糊涂。太宗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吕端奉行黄老之说，从政要诀为一“静”字。太宗也经常阅读老子的《道德经》，曾对待臣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

上溯至太祖朝，由于官官牵掣，职权不明，加之俸禄优厚，循默之风已起。开国元勋之一、做过几任宰相的赵普，就反对来自下面的改革呼声。他在公厅的屏风之后，放置两只大瓮。“凡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满即焚于通衢”。后来的宰相，也多是通吏道、循规矩之流。当时有一则逸事：陶谷文章号称宋初第一，他嫌朝廷对待词臣待遇不丰，要求离宫。宋太祖说：“此官职有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不准许辞，也不进用。以致陶谷题诗于玉堂：“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忧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见《续湘山野录》）

延至太宗，当然喜欢吕端这样“罕所建明”的宰执大臣。宋真宗时的宰相李沆，被称为宋代守成第一贤相，时人却给了他一个“没口匏”（无嘴葫芦）的绰号。他曾对同僚说：“吾为相无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报国。”一次病重。真宗前去探望，问起国事，他说：“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

但朝中毕竟有一批出身较为清寒、头脑较为清醒的士大夫意识到了帝国的危机，要求改革弊端。这里说开几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组合中，士阶层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一方面他们博通礼、





乐、射、御、书、数六种统治之术，拥有参政的实力与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具有建构和阐述政治文化的能力和兴趣，因而对每一项政治行动的决策、执行、评估都有影响。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二元结构的政治格局，一元是皇权官僚政治机器，一元是从政但尚未被这架机器完全同化，以及在野的士阶层。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对皇权政治的认同中，士阶层仍竭力维护自己的理想和独立，坚持理尊于势、道统高于王统，不甘沦为皇权政治唯唯诺诺的工具。“为帝王师”与“格君心之是非”，是他们世代相承的美好梦幻。孔子坚持“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提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士只是在操作层面上作为官方行政管理的工具，在价值层面上往往奉行内圣外王的统一，从人格修养上推衍出仁政王道，这就难免与从自身狭隘利益出发的皇权政治发生冲突，并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所谓“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尽管大一统的政治不断造就对皇权的迎合与谄媚，但从整体上看，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阶层则以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构成现实政治的反对力量，尤其在国难当头、社会板荡的危机时刻。而皇权为稳固自己的地位，对付士阶层也有两手，一是血腥镇压——焚书坑儒、党锢之祸、文字狱……；二是高价收买——汉高祖“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唐太宗“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彀中，是弓力所及之处，用现代话说，是进入我的火力圈内。这个彀中是不可轻入的，进入后，就要受到主子的驯养）……但这两手在实质上都是饮鸩止渴的自杀政策，当士阶层日趋萎缩，只能“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甚至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时，统治机能也就被极大削弱，社会危机便更加激化。几乎可以断定：对士阶层压制最为酷烈之日，便是王朝面临崩溃之时。

文归正传。当时的国势尚未如此严重，君主还有一些纳谏的气度，甚至偶生变革的意向。至道三年（997），王禹偁上疏言事。特别指出“减冗兵，并冗吏”。宝元元年（1038），苏舜钦上书，直指仁宗“燕尔逾节，赐予过度”、“政事不亲”，“又府库匱竭，民鲜盖藏，诛敛科率，殆无虚日。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宋史》本传）。宝元二年（1039），宋祁上奏言“三冗”：“有定官无限员”、“一官未缺，十人竞逐，